

# 君主之鉴

林国荣 著



海国图志系列



上海三联书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君主之鉴

林国荣 著



海国图志系列



上海三联书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主之鉴/林国荣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4

(六点学术·海国图志系列)

ISBN 7-5426-2071-1

I. 君... II. 林... III. 道德-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384 号



出品/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倪为国  
装帧设计/魏宇刚  
美术设计/吴正亚  
责任制作/朱晓雯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及文章中作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海国图志系列

君主之鉴

林国荣 著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200031)

<http://www.sanlianc.com>

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458734

印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4 月第 1 次

开本/890 × 1240 1/32

字数/175 千字

印张/12.875

书号/ISBN 7-5426-2071-1

定价/26.00 元

## 海国图志书系·弁言

点点

### 1

把史书翻到当年，国朝有个进士叫魏源，因亲眼目睹了我们国门被洋人从海上打开，天朝大国时局剧变，蜂拥而至的舶来品都以海洋命名，诸如“西洋”、“洋人”、“洋装”、“洋枪”、“洋炮”之类话语也盛极一时，于是他编撰了一部名叫《海国图志》的大书，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政及练兵情况，愤然挑明国朝御敌图强之道、国人安邦兴国之策，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

再翻洋书发现，洋人对海洋认知远远早于国人，1609年，荷兰人格劳修斯就匿名发表了《海洋自由论》，从而成为第一个倡导海上自由的先行者。波斯人曾把海洋奉为神明，希腊人专设一位海神以示敬畏。西洋文明史的血腥序幕就此从海上拉开了，从此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空间秩序观念开始形成了。坚实的陆地成为国家的领域，而海洋则保持自由，这构成了欧洲国际法的惊人的两元格局（施米特语）。近百年来，国人的强国梦多半是落在地平线上的，国人对陆地的兴趣远胜于海洋。中国是个海国，对海洋的认知方式和程度关乎图志复兴、和平崛起的大问题。

## 2

今日国人，可谓个个“睁眼看世界”了，但看到什么？学到什么？自然就不好说。“海国图志”书系是一群“出海”年轻人“睁眼看世界”写下的文字，是他们“看世界”的点点滴滴。

出海的人，大抵有两种人：一是水手，二是海盗。水手自然是关注自己的“使命”，寻找一片海国图志的汪洋；海盗关注的是他人的“财富”，寻找一个经世致富的饭碗。当下的学界出海留学的人甚多，海盗水手混杂。但海盗终究是海盗，水手终究是水手。面对“海洋”是要有进路的，当下迷失“海洋”，误读“西洋”，比比皆是，误国误人误事，屡见不鲜。“海国图志”书系的作者是“水手”还是“海盗”，读者自有公论。我想说的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家总会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跟着谁犯“错误”。

海盗、水手无一例外。

## 3

有一件旧事值得重提：据说当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印数极少，备受冷落，二十年间印刷五次，仅一千册左右。此书传入日本，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余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此书“看世界”，可以说，《海国图志》给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下了“猛药”。今日重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警言，尤其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海国，可以提示我们思考：“对于人类而言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有可能彻底地、完全地以海洋为基点进行生活和思考。一个民族完全可以将其政治存在全部安置在海洋这一元素中”（施米特语）。无疑，迄今乃至在未来文明史的光谱中，海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色彩。

于是我们重设“海国图志”书系，旨在重新认识西洋，重视海洋。是为序。

献给

我的父母

他们带我行走这苦难的人生，

并教我成人

## 序言

### “心事浩茫连广宇”

——林国荣和他的文本世界

孙绍先

认识国荣快 14 个月了，但这个年轻人给我的惊奇感仍在继续。

在国荣身边有两个不大相干的世界：一个是每每令他头疼不已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让他流连忘返的文本世界。

在第一个世界里，他的实际年龄 27 应当减去 10 岁，国荣的处世水平仅相当于小学生。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的亲授学生，他也无法“摆平”各种关系，于是他想逃避所有的人际关系，他几乎不接任何人的电话，更不用说自己配手机了。他与所有“他者”的联系都只通过无需实时对话的电子邮件。我有时在想，要是没有互联网，你林国荣如何面对现实世界？

他也有一帮相知很深的朋友，但是好像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互通知识文本时建立并维系着的，也浮在知识文本构成的纯净空气中，与现实世界大有距离。

在第二个世界里，他的实际年龄 27 应当再加上 20 岁，这个文本世界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他所阅读的文本；一是他写作的文本。无论是哪一部分，他所拥有的数量和质量都与他的年龄反

差极大，他是这个文本世界里少年老成的“将军”。国荣下笔汪洋恣肆，他笔下的文本内容多半在地中海沿岸横冲直撞，古希腊古罗马的旗帜常在阵中飘扬。这也是我一直讶异之处。20多岁的阅历，对西方从古希腊到近现代的经典原著的熟悉程度已是不得了。他用这么短的时间读了这么多的书，其刻苦与痴迷程度可想而知。在那些异国文本当中，并未走出国界的国荣找到了属于他的世界。但是这个文本世界远不是精神的乐园，倒常常是沉浸其中的笔耕者没完没了的苦役。

我想他沉浸在文本世界里的时间要远远多于现实世界。

### 一、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人和政治家屡屡出现在国荣的各种著述中，我想这不仅仅是他所学专业知识的承袭的结果，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国荣在他的著述中直面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文章不多，表面的解释可以归结为其中学的根基不够深厚（就其年龄来说，这近乎苛求），但国荣对西学的迷恋与他作为一个中国热血青年有直接的关系。不知为什么读国荣的文章，使我常联想的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虽然他经常在文本里议论纯西学的话题。国荣在骨子里是把“治世”与“治学”合二为一的。他极少做象牙塔式的“纯学问”。

在国荣对西方政治伦理的一系列分析文章当中，似乎包含着这样一种精神诉求的链条：

中国正在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困扰和考验，这种困扰和考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全球战略而更趋复杂。

中国是世界“现代化”道路上的后行国家，有着天然的照搬先行国家的功利性冲动。这种冲动往往表现为对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现行政治经济政策的攀附。或者至多只将审视的目光延伸到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期。这就蕴含着巨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

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有着更深远的历史渊源。就像我们区别松树和柳树,不仅要看到枝叶的不同,更要想到这种差异其实早在种子里就存在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是西方现在这棵大树的种苗和根系,要想了解分析这棵大树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是不能回避的钥匙。

应当说中国的近代学者,还是很注意研究西方思想的整个脉络,但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家却大都没有这种眼光。以至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中国仅仅作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存在。这和中国人(特别是官场和管理层)热衷于学习“易经”、“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曾国藩谋略”等等古董,并以此来参与当下社会的现代化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道我们还天真的以为“现代化”是一件距我们的老祖宗的“心法”和“家法”更近的事情?

毛泽东对马克思以前的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不感兴趣,也明确反对“言必称希腊”的“媚洋”倾向。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中国人当代看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借鉴先行者(他者)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恐怕要超过借鉴本国的历史。既然大多数的学者相信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无法自然演变到资本主义阶段;既然世界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在西方主导的背景下展开,那么,忽视西方政治伦理历史经验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就连中国的许多学者对此也缺乏清醒的认识。

因此,国荣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社会权力结构的剖析,对

君主和政治家的解说,无不暗含着对中国当代政治取向的隐忧。即使他在论述西方近代人物事件的时候,他的笔触也经常延伸到古希腊和古罗马。

我们可以了解西方人起初是怎样涉险走过来的,不需要完全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更不要急于从西方现代这棵大树上折些枝叶嫁接在中国的树干上。完整地看西方,历史地研判西方民族精神史,就不仅仅是个纯学术问题。这是中国有远见的人都应该选修的国际政治课。但国荣的良苦用心不一定有多少人赞赏。

从结果上来说,这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 二、关于“权力”

在国荣笔下的文本中,涉及到的时间与空间维度是国内其他学者的文章所少见的。在他评说的众多历史人物和文本中,“权力”及权力关系是他关注的焦点。

中国古老的“君权神授说”,在国荣看来是不值一驳的谬误;由古希腊民主制缘起的“权力契约说”(中世纪的“神约论”与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期的“民约论”当是“权力契约说”的两个极端的版本),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打着民意旗号的权力本质说,在其漫长的实践过程中,从未真正地被体现过。只此一点足以令人生疑。

全球以民族和国家权力为代表的历史实践中,暴力一直是权力的基本特征。军队、警察、监狱是国家政权的基本表现形式。在父权社会的历史上,还没有哪种权力不是暴力运作或托举的结果。在世界历史上,越是疆域广阔的大帝国,其背后隐藏的血腥气越重,东西古今,概莫能外。无论是西方的罗马帝国、

沙皇帝国，还是东方的蒙古帝国、清帝国，杀人都是其扩张或维系统治的基本手段。希特勒已经因种族灭绝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他之前的许多杀人魔王还在享受世人的香火。即便到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以所谓“民约”方式，人本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帝国，其残忍程度并未有所收敛。美洲印第安人和黑奴的血泪；欧洲犹太人的哭号，无不证明着这一点。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巨大灾难，正是由当时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和模仿他们的日本造成的。

“权力正义”说(或曰“权力道德”)是紧随“权力契约”说而来的逻辑推衍结果。无奈权力的手指始终无法穿透阶级和种族的铁幕，一国人心目中的“明君”“大帝”，可能正是另一国人民的恶魔和公敌。德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选择了希特勒，比之雅典人用民主的方式判苏格拉底死刑更让后人惶恐困惑。在欧美漫长的“权力正义”实践中，“正义”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最后也只能普及到议员范围，遑论超越国界？列宁曾发出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惊世号召，这即使不是出于解当时苏联困局的权宜之策，也不会真正起什么作用。列宁要废除俄国与周边国家不平等条约的庄严承诺，被他的继任者忘得一干二净。斯大林很快就成了比历代沙皇更贪婪的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尽管他一直打着国际主义旗号。

中国以其漫长的儒家伦理权力观闻名于世，正史、野史差不多都用社会道德观来解释权力的获得与丧失，分析朝代的勃兴与覆亡；这使得大部分中国人不自觉地倾向“权力道德”说。列宁关于权力与道德关系的名言：“手段的卑鄙反映了目的的卑鄙”，在中国人中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与此相反，马基雅维里的权力学说遭到长期的封杀和唾弃。但是，在中国有史可鉴的社

会历史中,权力的血腥与滥用,绝不比其他国家逊色。以至于后世儒生只好将权力道德的奖状送予传说中的尧舜。与此大有关系的是,历史上国人忍受权力暴力的程度是世界各民族所罕见的。

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都宣称:他(们)的权力来自人民。也许说出的是“真理”,但是,这是一个从未进入历史的口号式“真理”。它非常容易在学理上证明,但却总是在实践中缺位。

国家权力在对外时,其实就只剩下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国与国的差异是永远存在的,那么“落后就要挨打”的现象便在所难免。只要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与流氓与流氓间的关系差不多,那么有关权力的任何理想与浪漫的辞藻便都是“水中月镜中花”。大骂别国是流氓国家的美国,难道不是今天世界上最强盛的流氓国家吗?至少在对外关系上是如此。

“以仁义治天下”或“以正义治天下”,在学者,是书生式的呓语;在君主,是骗人的鬼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概是道出了权力运作的真实结果。

### 三、关于政治家(或统治者)

因为关注权力现象,国荣就不能不关注操纵权力的人。古希腊的执政官和僭主;古罗马的皇帝和将军;以及现代政治舞台上的枭雄如丘吉尔、斯大林、布什等等都是国荣捉笔如刀的解剖对象。判断一个历史上的政治家是否有作为,好像并不难,只要看他开疆扩土的本领就行了。只要是一个成功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他私下做了什么就都可以原谅。李世民弑兄囚父,谋权篡位,已属大奸大恶之徒。但他是大唐盛世的缔造者,便有了千古

一帝的英名。

政治家不是英雄，英雄要有尊严，政治家则只看重结果。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英雄，他以自我情感为中心，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敢爱敢恨”，只有英名永留后世；俄底修斯便是政治家，他可以不露声色地周旋于各种关系当中，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阿喀琉斯可歌可泣，但暴死疆场，俄底修斯虽历经磨难，但终于财产、妻儿、生命和名声均得保全。这在归宿上似乎也昭示了英雄和成功的政治家截然不同的命运。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权民族文化时代以来，各民族和各国政治家就逐渐取代了英雄的位置。对政治家应该提出怎样的道德要求一直是困扰公共舆论的难题。从资产阶级的“人人平等”与“普世公平”的道义来讲，政治家绝不该享有特别的道德豁免权；而从政治家的发迹史来看，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家，都信奉并实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人生准则。从古希腊的僭主，到美国的尼克松、克林顿，其为人的道德水准大都比普通公民还要低下。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他们更是常常连道德遮羞布都不要，出卖朋友，与敌人密约都是司空见惯的手段。

正因为如此，老百姓大都不喜欢政治家，称他们是“政客”。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哪个民族都离不开政治家，更需要手腕高超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于是对于政治家就慢慢形成了不得不认可的半遮半掩的双重道德标准：只要是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一个政治家的国内恶名仅仅限于他有以权谋私的行为。一种庸俗化了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了事实上的权力游戏规则，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得安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古老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成见的翻版；是权力永远与“正义”貌合神离的根源。

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持超然的立场(除非他是外星人)。“民族主义”“国家利益”于个人而言,是大得令人恐惧的旗帜。这就是政治家们的温床。

今天,以民族主义划分的世界政治格局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各种新旧普世主义学说连遭挫折,建立“国际宪法”如同痴人说梦。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政治派别连最起码的共同道德伦理底线都难以达成。像“不偷盗”、“不杀人”、“不奸淫”、“不说谎”等等如果不加上限制词“在某某情况下——”,就不被人类共同认可,遑论其它?而一旦加上了各自有不同理解的“在某某情况下——”,也就等于取消了共同约定的可能。

国荣力图客观公正地去评价政治家,不过也很难跳出国家主义的价值观。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探讨政治家公德建设的背景与可能性。在本集的一篇文章中,他贬布什,褒丘吉尔大概是出于这种考虑。

该怎么形容温斯顿呢?他不是平民,也不是贵族;不是领袖,也不是王者;不是臣民,也不是帝王;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也不归附于他;他单枪匹马,杀入宦海,到达权力和荣耀的顶峰,随又黯然退出。在城邦中,找不到永久适合于他的固定位置。他从事的是“超乎人性、近乎神明”的事业,并且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无论如何,还有一个词是留给温斯顿的——“政治家”,他不是民主人,但他是民主的朋友。

这段对丘吉尔的评价,堪称国荣式思维的经典段落。

#### 四、关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

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就是“西化”。不但保守派这样想，改革派也这样想。这恐怕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会。很希望国荣就这个问题多作些研究。

我以为，“现代化”在文化意义上就是一种扬弃所有民族文化的人类“大同文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是所有单一民族文化的灾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今天，这种“大同文化”趋向首先出现在西方只是表明传统的欧美文化圈对它的抢先认同，当然这种抢先认同的机遇是西方民族文化存在着更多的亲近科学的文化基因。西方的现代化骨子里也是一种非民族化的过程；非希腊化，非拉丁化，非日尔曼化，非英格兰化，非法兰西化……。当世界上其他地方还在风行民族主义的时候，西欧、南欧、北欧、中欧各国正不断地走向一体化（北美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也已开始，亦说明这种趋势绝非偶然）。1995年，一向被我们视为“殖民文化”输出大国和“西化”大国的法国，郑重其事地由议会通过决议，大声疾呼“维护法兰西语言文化的纯洁”。可见，在法国这样“西化”透顶的国家仍不是个别人担心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被异己的东西“化”掉。

“欧化”或“西化”这类概念，当初就是对以欧美地区为先导的现代化心存疑惧的人刻意制造出来的。这种以民族地域方位标定外来文化性质的做法，就是想最大限度地激起本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排异反应，“西学”与“中学”的对立即由此而来。中国人，特别是某些上层中国人，有意无意制造被异民族文化征服同化的恐慌，并以此作为固守民族文化传统的杀手锏。17世纪满族挥兵南下之际，差不多所有的汉人都有做了亡国奴之感。风

起云涌的“抗清复明”斗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然而，乾隆之后，大多数汉族人便认同了清政府统治下的国家是自己的“祖国”。那么究竟是汉族“满化”了呢，还是满族“汉化”了呢？似乎谁也说不清楚，也似乎再无人计较。孙中山最初狭义的民族主义革命口号“驱除鞑虏”很快就废止了。原因是这是大中华圈内的同化，假如我们把“大中华”观念置换成“地球村”，那又如何呢？是不是可以说：“谁化了谁并不重要”呢？

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以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呈现出来的。历史的经验表明：民族文化的差异不取决于人种学数据，而取决于此民族（或文化集团）与它民族（或文化集团）之间的冲撞交融程度。

大同观念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超种族，超地域，甚至超物种的生命同一观念。这种观念在现代科学的促进下，在全球市场经济的带动下，正在瓦解各种封闭保守的民族地缘文化体系。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大同观念”不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观念的放大与延伸；而是超越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的未来形态的世界文化或人类文化。它的扩散与发展是不以各民族意志为转移的。从物质利益的关系来说，先适应者，受益；后适应者，受损。

世界各个相对“落后”民族在遭遇“现代化”时，其决策阶层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拒绝”的姿态，但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都被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所裹挟，早晚而已。这种潮流可以被表述为“现代化—世界化”。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火车头，至于它要将我们载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但是，企图卸下这个“火车头”，代之以人控马车是不可能的。我们感觉到了科学技术与人的精神日益离心的倾向，感觉到科学技术对人的冷漠，但这仍不是我们重新回到封闭半封闭民族文化状态的充分理由。



当然并不只是中国人现在还不认可“地球村”的概念，就是欧美政界、学界的一些人也常常以现代化的“宗主国”自居，有意模糊“现代化”与“欧美传统文化”的界限，为自己扮演高人一等的世界警察寻找借口。不能否认，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接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优势，向世界推销与现代化无关的私货。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把现代化与“美国化”等同起来。

美国是个缺少单一民族文化遗产的移民国家，它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如此迅速，与它较少受民族文化传统束缚有关。今日的美国文化不是英国文化的翻版，不是法国文化的顺延，也不是英国文化加法国文化加德国文化等的混和。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的美国已经“世界化”了，美国的民族文化一旦形成，也就有了自己的传承，也就或多或少地开始阻碍美国自己的“世界化”。

以科学技术为火车头的世界现代化，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会给积极顺应它的民族和国家以巨大的好处，但绝不会被导入某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既定轨道。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之所以屡屡破碎，就是因为前几代国人非要给它套上“民族化”的笼头不可。纵观百年来各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格局，我们不难看出，凡是将“民族化”置于“世界化”之上的国家，其现代化便夭折，凡是将“民族化”与“现代化”并重的国家，其现代化便放慢，凡是将“现代化”置于“民族化”之上的国家，其现代化便加速发展。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现代化”政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朝野人士竞相献策；如建议废除日本语，全国改用英语；杀光所有的蒙古种马，引进西洋马；在激